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魏晋清谈 思想初论

贺昌群 著

商务印书馆

H310
21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贺昌群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200010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贺昌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商务印书馆文库)
ISBN 7-100-02799-3

I. 魏… II. 贺… III. 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058 号

本书依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重新校排,
并增补作者两篇文章。

商务印书馆文库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贺昌群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99-3/K·591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2
印数 1 000 册

定价: 10.50 元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 1897 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用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

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年10月

目 录

序言·····	1
上篇 汉魏间学术思想之流变·····	2
中篇 魏晋之政与清谈之起 ·····	27
下篇 清谈思想初论 ·····	58
附录·····	115
烽燧考·····	117
汉唐精神·····	159

序 言

历史学为通儒之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故往往言远而意近。世无纯粹客观之考证，亦无纯粹主观之议论，客观与主观，如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此编不敢以考证之缜密自居，亦不能以议论之空疏自薄，盖将窃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又将窃取乎通古今之变耳。观近代政治文化尚权竞力之趋势，殆已积重难返，故世变日亟，战乱方兴。兹编之作，或正郭子玄所谓“有不得已而后起者”在也。

寇乱以来，转徙西南，或穷山论学，或黉舍讲艺，朋好间讨论之乐，最可感念者马湛翁、熊子真、梅迪生、楼石庵、刘弘度、宗白华、贺自昭、叶圣陶诸先生，于此书之成，前后皆有因缘。汤锡予先生所居殊隔，不谋而意归略同。区区则侧于历史与文化之解释，聊以发潜德之幽光，非敢谓有所创获也，大方君子倘进而教之，幸甚。

民国 33 年 10 月 5 日贺昌群自序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

上篇 汉魏间学术思想 之流变

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魏晋清谈之起，在学术上盖上承东汉方术道家与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弃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兴之一部分，则为先秦诸子学之重光，与印度思想之流入。至汉末三国，因政治社会之巨变，遂形成一种韵味悠长之思潮，名曰清谈，^①至魏正始之际，始树立宗风，六朝称曰玄学，绵亘三百余年之久，其间大同小异，流别纷繁，非好学深思，体察深远，或忘怀得失，想与感应，难以究其极致。加以玄学理趣，妙擅音辞，

① 清谈之名，初见於《后汉书·卷一〇〇·郭泰传》：孔公绪（偃）清谈高论，嘘枯吹生。《魏志·卷十三·刘繇传》裴注引《魏略》：太子（丕）报繇书曰：“至于荀公（爽）之清谈，孙权之斌媚，执书喟噓，不能离手”。《文选·卷四十二·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云：“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则清谈之初义，不过词清语妙，不必如正始之音，专以谈玄说理者尽同”。

鲜重传录，^①此当时与后世之论清淡者，所以有浅深之别，是非之辨也。

按两汉学术思想之变迁，可分三期。第一期武帝以前犹存战国之余风。第二期自董仲舒议定儒家为一尊，尚公羊春秋，推阴阳，言灾异，刘向继之，治谷梁之学，更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自是儒家经典，遂与纬讖阴阳五行灾异之说相结合，在政治上发生极大之影响，终始五德及符命之说，开中世禅代之风。第三期自东汉巾叶以后，沿第二期之流波，加以外来方术之兴起，诸子学之复兴，及佛教经典之译，直至魏正始之际，乃又为之一变。而其间为之连锁者，则《易》、《老》、《庄》三书也。今依次分别言之。

一，外来方术之兴起 方术之兴，起于战国，方术之名，初见于《史记·卷十二·武帝纪》：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帝有爱姬王夫人卒（《汉书》作“李夫人”），少翁以方术夜致王夫人。李少君、栾大等并以方术封侯。操其术者曰方士，多海上燕齐之人，《史记·卷六·始皇本纪》：三十七年遣方士燕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药。始皇欲长生久视，自称真人。则秦皇、汉武时，方术之内容，大抵为讲求鬼神仙药之事。及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方术乃

^① 《世说新语·赏誉篇》：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益者浅，体之所益者深。闲习礼度，不如正式瞻仪形，诵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可证魏晋清淡之重音辞理趣，故鲜传录。

与纬讖、阴阳、五行、灾异合流，范曄《后汉书·卷一一二·方术传》序谓：“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东汉方术亦称道术，方士亦称道士，能作符咒，疗疾病，役鬼神，通五经，善图讖，道教由此而兴。桓灵之世，诸说又牵附黄老。明帝永平中，佛教虽已传入中土，而汉人视之亦方术也。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大交通方士，为符瑞造作图讖，欲谋不轨（《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浮屠（Buddha，华言佛也）之教，而以斋戒祭祀为务，何异于鬼神方术，汉代百神祠祀盛行，佛教输入之初期，汉人必与黄老鬼神方术等夷视之无疑，故襄楷《上桓帝疏》中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之语也（《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汉末，东西交通逐渐频繁，方术之内容，乃与东汉中叶以前大异。东汉中叶以前，方术为阴阳、推步、图讖、纬候，号为内学，其流则有风角、遁甲、望云、省气、验察、妖祥，如任文公、郭宪、高获、谢夷吾等，范曄列之于《方术传》上篇，明其与下篇汉末唐曼、公沙穆诸方士之术异也。其时针脉符咒之术，流行于方术佛道之间，如郭玉为人治病，一针即瘳，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后汉书·卷一一二下·本传》）。华佗精于方药，针不过数处，平脉之候，其验如神。佗又制漆叶青黏散，服食可益寿，时人以为仙。章怀注：“字书无黏字，相传音女廉反，然今人无识此者，甚为可惜。”（《后汉书·卷一一二下·华佗传》）。按《魏志·卷二十七·华佗传》“黏”作“黏”，裴注引《陀别

传》云：青黏一名地节，一名黄芝。）魏晋清谈家服食寒食散（详下节），始于何宴，《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云：“寒食散之方，虽出于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则此类方药，至少在汉季已流行，且不特方术家多操其技，僧徒亦多能之，安清（字世高）译经最多，为一代大师，《高僧传》（卷一）称其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无不综达。吴时，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亦谓世清博学多识，针砭诸术，睹色知病。牟子《理惑论》（《弘明集》卷一）言佛家有病，则进针药。可知当时方术与西域沙门之关系，必甚密切，针砭医药之术，必有自来。（参考陈寅恪先生“《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符咒之记载，不见于西汉史传，东汉中期始渐传说。费长房见一老翁，为作符，使主地上鬼神，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后汉书·卷一一二上·本传》）。曲圣亲善为丹书符，劾厌鬼神而使命之（同上《解奴辜传》），张角太平道与张鲁五斗米道，皆以符水咒说，疗治疾病（《后汉书·卷一〇一·皇甫嵩传》，《魏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汉晋间葬礼亦尝以符咒为厌胜之意，挽近洛阳长安出土汉晋陶瓮数事（日本中村不析氏《禹域出土墨宝源流考》卷上），如永寿二年（桓帝）二月一器，其上朱墨隶书八十七字，末云：“死生异簿，千秋万岁，不得相复求索，急急如律令。”又建宁四年，熹平元年，光和四年（均灵帝年号），初平四年（献帝），各一器，晋太康三年（武帝）一器，

或作“急如律令”，或作“急如地下诏书如律令”，皆所谓道家符咒雷边捷鬼也。^① 魏晋名士亦多服其术，《世说新语·术解篇》云：

郗愔信道甚精勤，（按《晋书·卷六十九·郗愔传》，仅言愔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愔子超传，则言愔事天师遣，《世说·排调篇》注云：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常患腹内恶，谋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二，诸子之学重光 武帝时，儒家之学定为一尊，百家遂罢，故专制统一时代之学术思想，大都整齐划一而缺乏生气，多为一事一物所能笼罩，此名物训诂是也，又多为一派所操持，此经师家法是也。东汉巾叶以后，外

① “如律令”一语，盖出于《诏书》，汉时上告下之文亦用之。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簿书类》第六简有“口言到口如律令”。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汉简中，亦多有之。汉晋间葬礼，取为厌胜之意，道家符咒，亦相沿袭。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引程大昌《考古编》（按《儒学警悟本·考古编》查无此条）云：李济翁（匡义）《资暇录》曰，今人符咒后，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当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风俗通·论汉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故文书下律令，言当承宪履绳，动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凡行移悉仿官府制度，则其符咒之后，云如律令者，正是效官府文书为之，不必凿以为雷鬼也。大庆按，文选袁绍徵豫州，终曰如律令；曹公檄吴部曲，终亦曰如律令。是知李说之谬，盖律者所以禁其所不得为，令者所以令其所当为，如律令者，谓如律令不得违也。昌群按：道家符咒，正是效官府文书为之，诚如程氏说，故大庆复以袁绍曹公之事而实之。王楙《野客丛谈》卷十二亦驳《资暇录》谓汉末无雷边捷鬼之说，今观中村氏所获洛阳长安出土汉晋陶瓮之文，皆可谓雷边捷鬼，未可斥为虚构也。

戚之专横，宦官之祸乱，西羌之侵扰，灾害之流行，政治社会呈大不安之状，及黄巾、董卓之乱，两京涂炭，典章残落，文教荡然，而人生意义与学术思想之转变，乃必然之趋势，《后汉书·卷一〇九上·儒林列传》序云：

本初(质帝)元年，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中略)自是游学增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浮华一词，乃汉人常语，《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建初五年诏举直言极谏，其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又(卷五)《安帝纪》：延光五年，诏三公以下各举所知，皆隐审尽心，勿举浮华。浮华，盖不实之意也。魏晋之际，遂以浮华指清谈，《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晋阳秋》云：陶侃戒其士吏曰：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晋书·陶侃传》作养生)，自谓宏达耶。《晋书·卷三十九·荀勗传》：勗上武帝言，凡居位者，务使思萧(何)、曹(参)之心，以翼佐大化，便昧宠忘本者不得容，而伪自息，浮华者惧矣。又(卷五十)《庾峻传》：高贵乡公时，重老、庄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又疾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据此观之，魏晋之际，所谓浮华，实指清谈而言。而清谈家则自称其所谈曰风流，《晋书·卷九十三·王濛传》：濛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时人以刘惔方荀奉

倩，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以濛惔为宗焉。又云：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阔恬和。《世说新语·赏誉篇》下：范宁谓王忱曰，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而汉末所谓浮华，则指清谈之启明期从事于思想解放者而言，读上举章安二帝纪之文，可知也。

汉末，因内忧外患之严重，在政治社会上，一部分人知不能挽既倒之狂澜，独善其身，遁世以自保，申屠蟠、徐稚、黄宪、向栩，王烈之伦是也。矫激者，则愤世而欲为时政之改革，党锢诸人是也。在学术思想上，六经章句之学，“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赞），劳而少功，疑而莫正。于是穷则变，而为之启导其端倪者，则先秦诸子学之复兴也。古今一切学术思想之创立，政治革命之鼓吹，莫不凭借过去（Thinking backward），以推进现实（Living forward），前者谓之托古，后者谓之改制^①。汉晋间诸子学之重光，正所以促进其时代思想之解放也。其风约自安帝之世马融始。《后汉书·卷九十四·延笃传》：笃从马融受

① 例如先秦诸子之托古改制，托古是 Thinking backward，改制是 Living forward。道家托黄帝之古，而创立其清心寡欲之说；墨家托大禹之古，而创立其兼爱非乐的苦行哲学；儒家托尧舜之古，而创立其唯心的仁政哲学。古今一切政治革命，无论其成功或失败，无不运用此理。王莽以复周官之古，而推行其土地政策，曹操欲吞并汉室，扩张其势力，而复禹贡九州。王安石欲推行新政，而鼓吹其新经义。孔子盖最能运用此理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久矣乎，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固欲将周代礼乐之治，发扬而光大之，以重新建立一种政治的伦理的新轨为目的者也。所以删诗书，订礼乐，号为述而不作。

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而融又为最早标举老、庄合一之义者(详下)。又如曹丕博贯经传、诸子百家之书(《魏志·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魏书》)。甘宁亦颇读诸子(《吴志·卷十·甘宁传》)。其时刑名墨家之学，亦盛极一时，散见于魏晋史传中者甚多，略举数例：管宁避地辽东，韬韞儒墨，潜化滂流，畅于殊俗(《魏志·卷十一·本传》)。吴质《答曹植书》云：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已久矣。(《文选·卷四十二·吴季重答东阿王书》，又《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张敏集“头责秦子羽文”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晋书·卷九十四·鲁胜传》：元康(惠帝)中，胜尝注《墨辩》凡四篇，又采诸杂集为刑、名二篇，其叙谓：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世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可知魏晋之世，诸子学之复兴，盖绝学坠绪之重光焉。至向秀、郭象注解《老》、《庄》，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而“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

与墨家相连者，为刑名之学，刑名即形名，形刑古相通，鲁胜《墨辩》叙云：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中略)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

而有异，异而有同，是谓之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隆污，名之至也。

此魏晋间名家之界说也。刑名学之重兴，始于曹操之时，傅玄《上晋武帝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尔后言名理者甚多，今举数例：钟会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魏志·卷二十八·本传》）。王衍称裴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世说新语·言语篇》）。裴遐善叙名理，辞气清畅，冷然若琴瑟（同上《文学篇》注引邓粲《晋纪》）。卫玠少有名理，善老、易（同上，注引《玠别传》）。谢玄能清言，善名理（同上注引《玄别传》）。李充好刑名之学，而深抑浮华之士（《晋书·卷九十二·本传》）。谢安少时，尝请阮裕讲白马论，谢不即解，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易（《世说·文学篇》）。司马道子问谢玄：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同上引）。大概魏晋间所谓名理者，相当于今之逻辑，亦称论理学，亦即印度之因明，为一称思辨推理之学，初无所谓“派”也。王导初过江左，止标三理：一嵇康之《声无哀乐论》，二嵇康之《养生论》，三欧阳建之《言尽意论》，宛转音辞，无所不入。《言尽意论》略曰：“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迁，

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矣。”（《世说·文学篇》注引）此庄子所谓“名者实是之宾也”。若不真得其理，而徒作游辞（《世说·文学篇》：殷浩尝至刘惔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则名与理不能一致，故曰：“相与为二矣。”若名理双彰，则言无不尽，言无不尽，则名理为一矣。一切逻辑上之丐辞（此从严复译名，西名 Fallacy），皆由名与理不能合一之故。

其时言兵法者亦盛，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钞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杂语》）。孙权尝谓吕蒙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吴志·卷九·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王衍为一代清谈宗师，其初亦好纵横之术（《晋书·卷四十三·本传》）。刘晔之子陶，才高而行薄，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尚，精名理，有大辩（《魏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王弼传》）。袁悦（按：《晋书·卷七十五·本传》作袁说之）能长短说，亦有精理，丁艰，服除还都，惟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世说·谗险篇》）。魏高诱尝注《吕氏春秋》、《战国策》，至今犹存。此为儒家道家以外诸子学之繁兴，盖魏晋间思想解放运动中一时之风气焉。